

延安舊話

張文伯

這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，時值抗戰後期，中共盤踞陝甘寧「邊區」，以延安為根據地，正要與政府開始和談，歡迎記者們前往參觀。三十三年五月，陪都重慶便有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組成，筆者時任重慶中央日報主筆，得有機會參加。全團共二十一人，於是月十七日出發，經由西安、臨潼、華陰、潼關、大荔、郃陽、韓城、宜川，東渡黃河至晉西的山西省政府所在地克難坡，然後渡河進入陝北「邊區」，向延安進發，展開參觀活動。再取道洛川、中部、宜君、同官、耀縣、三原、回到西安，轉回重慶，全程歷時凡七十日。

當時的延安，對中共而言，有如過去的瑞金，今日的北平，為其發縱指揮的核心所在，實包藏有無限的禍心。於今舊話重提，也許多少有些警世的意義。

鬥爭起家

中共是以鬥爭起家的，我們一入「邊區」，便到處臭得出火藥氣味。來到延安，已經歷了三次鬥爭場面，第一次在延長，因外籍記者發現三個反動標語而起。第二次在金盆灣三五九旅旅部，因筆者在他們歡迎晚會答辭時，強調統一的重要

，喊了聲「中華民國統一萬歲！」。蔣主席萬歲！」而起。第三次是在參觀藥廠時，匪幹藉口政府封鎖藥品而起。負責招待我們的就是三五九旅旅長王震，直接策動了這三次鬥爭，現在他已是偽國務院的「副總理」之一。

到了延安，中共「中央」也許認為這樣的「鬥爭」，有失中共的體面，王某受到緊閉處分，不再露面。周恩來還特地邀我一人去便餐，表示歉意，並談了很多話，下文再提。六月十四日，聯合國日的群眾大會，臨時加上一個節目：「動員軍民保衛西安」，更把他們的政治攻勢，發揮到最高潮。當天的解放日報，大放厥詞，把五年半來抗戰的主力作戰，大半寫在中共賬上。其後接着以「蘇俄愛國戰爭三週年」、「歡迎華萊士先生」、「長沙失陷的危機」，乃至七七紀念為題，發洩他們撒謊罵罵的憤技。

當時中共第一次整風運動已過，整風有三個口號：「反對主觀主義以整學風，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黨風，反對黨八股以整文風。」整風原是鬥爭的一個形式，而鬥爭的典型方式又是什麼呢？整風文件上說：「鬥爭是鬥爭得愈兇就愈好，問題提得愈嚴重愈好，搜集別人的錯誤愈多愈好，名詞用得愈多愈好，給別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，

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，批評與鬥爭的方式和態度愈嚴峻愈粗暴就愈好——講話的聲音愈大，面孔板得愈兇，牙齒露出來愈長愈好！」足見其橫蠻兇狠的一斑。

中共有三句口號：「組織起來」，「一元化的領導」，三「兩條路線的鬥爭」。他們運用其唯物辯證法、階級鬥爭的謬論先把人的「成分」分化，編隊編組，分成兩邊，使其互鬥。然後再分再鬥，再鬥再分，永無止境，永無寧日，這便是所謂「兩條路線的鬥爭」。目的在製造仇恨、猜忌、恐怖，便於集權統制，通過共產黨，把權力集中在毛匪一人之手，這便是所謂「一元化的領導」。所謂領導，也便是控制，再配合以路條「供給制」、「勞動改造」、整風運動，把任何人的腦袋、腸胃、手脚，都給連鎖起來。同時於歌曲和教科書上，儘喊「太陽出來一點紅」等等濫調，把毛匪捧上天去，普遍製造偶像觀念。

變化多端

有些人偏說中共是土地改革者，然則他們的土地政策如何呢？中共在瑞金，搞沒收土地的「政策」，沒有搞通。自二十六年起，在所謂「陝甘寧邊區」，已放棄以暴力沒收的「政策」。凡

已經沒收分配過的土地房屋，不再變更。「在土地未分配區域，實行地主減租減息，農民交租交息。土地已經分配區域，歡迎土地革命時期逃亡的地主回鄉，分給以耕種必需的田地與客房。」中共對於「政策」的改變，不承認有任何錯誤。毛匪在答復記者時說：「政策是隨三時期的環境變遷的，土地政策也有變化的。『內戰時』沒收土地，非實行社會主義，因為土地分歸農民私有。那時如實行減租減息，很難設想。但如在抗戰時沒收土地，那要迫地主跑到日本人那裏去，引日本入來了。所以現在實行減租減息，一般的政策是不算『左』的。將來幹不幹，是不是沒收呢？誰也不能預測。如地主與農民關係很好，可不沒收。如果地主兩隻手拿兩把刀，天天殺人，則非沒收他的土地不可。：中國對土地問題，必需徹底解決。不問那一黨願意不願意。最後的目的是『耕者有其田』。：將來可能用緩和的辦法來解決土地問題。」這些話，保留着一個任意伸縮餘地。如果說「耕者有其田」是土地政策的最後目的，則在 國父平均地權的遺教中，早有詳細規劃，何勞共產黨去另出花招？中共的財政收入，大半靠種植罌粟，製毒販毒，這也許是他們真正的「土地政策」。

中共的反叛性，基本上從「反人性」做基礎。毛匪早在文藝座談會上說過：人性「只有具體的人性，在階級社會裏，就是帶着階級性的人性，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。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。：所謂『人類之愛』，自從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以後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。：

階級使社會歸於分裂，階級消滅後，社會復歸於統一，那時就有了人類之愛。但在現時，則還是沒有。」所以他們鼓吹階級鬥爭，以爲鬥到無產階級專政，才能使階級消滅。其實專政便成特權階級，勢必爲被壓迫者的鬥爭對象。所以鬥爭不已，階級也永不會消滅。

「陽謀」種種

毛澤東自稱有一套「陽謀」，什麼「陽謀」呢？也是變化多端的。

這時中共自感勢孤力單，不敢經言無產階級專政，他們於「共赴國難宣言」中，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。其第一項是說：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爲中國今日之所必需，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。」然而他們也決不放棄馬列主義。所以毛匪又玩起「階段革命」及「新民主主義」的花招。他說：「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：第一步，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，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。中國現在的革命，是在做第一步。」「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，以完結其第一階段。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，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。」

毛匪從而貶抑三民主義，認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點有四，最重要的一點是：「兩個階段的不同的。共產主義於民主革命階段之外，還有一個社會革命階段。因此，於最低綱領之外，還有一個最高綱領，即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。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，沒有社會革

命階段。因此，它就只有最低綱領，沒有最高綱領，即沒有作爲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。」因此，他認爲「在現時毫無疑義，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，加緊馬列主義的學習。沒有這種宣傳與學習，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，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到勝利。」

當時記者問毛澤東：「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，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，是採何種革命方式？在社會主義革命後所行的政制，是否即無產階級專政？」他沈吟了一回，慢吞吞的說：「內戰對國家沒有好處，這個問題的正面答復是民主主義。中國缺少大工業，現在還談不到社會主義。這是多年以後的問題，時間無法算出，不過標準是可以說的：在中國經濟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，必需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，人民要求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。這八字是無人能算的。現在中國是封建的地租制度下分散的農業經濟，談不到社會主義。中共當前的綱領，是實行三民主義。抗戰及抗戰後相當長的時間，是完成三民主義的時候。所謂新民主主義就是三民主義，也就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所解釋的。由三民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，採取何種方式，現在亦很難說。如果三民主義實行得很徹底，大家是不是需要再來一次革命？可能性亦有。現在應該向着不需要革命的路走，那時可由人民開會來解決。一年開不了，開二年，三年都可以。至於社會主義革命後所行的政制，是否實行無產階級專制？也無法答復。可能

性是有，也要人民去解決。而且到那個時候才能解決這個問題。」這些模稜兩可的話，只是一個騙局，誘使國人上當，跟着他們一步步走向敗亡之路。

共產黨是善變的，但其本質不變。毛澤東最乾脆的一句話，便是「槍桿子裏出政權」。抗戰期間，實行一二七主義，即一分抗日，二分應付，七分擴張，儘量壯大自己，一面放出「和談」空氣，向中央要求番號餉糧，從事擴張。然後大吹大擂，虛張聲勢，再作進一步的訛索。當時記者曾問朱德：「各國政黨均無軍隊，中共的黨軍應如何使之成爲國家的軍隊？」他答道：「黨軍係歷史上造成的，換言之，即在革命過程中所產生，抗戰勝利後，實行民主，各黨的軍隊還之老百姓，此問題自然解決。現在抗戰時期，仍屬需要。因黨軍有黨的意識，總勝過以前軍閥私有的軍隊。」然則如何還要向中央請求番號餉械？朱德笑着說：「譬如過去封諸侯那樣，封一下，不是比較好些嗎？」總之，共產黨決不放棄武力，他們內而造反，外而圖謀征服世界，全靠這個。所以在本質上，永遠是一個暴力的叛亂集團。

所謂「民主的統一」

朱毛口中都說民主，「邊區」有民主嗎？沒有。他們標榜所謂「三三制」，以爲各級機構裏，共產黨占一份，國民黨占一份，其他黨派占一份，其實那裏來個國民黨或其他黨派？一方又喊所謂「一攬子會」，一股腦兒都歸匪幹獨霸去了，其後連表面的選舉形式，也給停辦。

「邊區」有法律嗎？沒有。他們把中央法規擱置一邊，任所欲爲。所謂法院，從屬於行政機關，依據「政策」辦案，而「政策」全在匪幹們的口中，說什麼就算什麼。

「邊區」有自由嗎？沒有。路條、教條、鬪爭、整風，把所有老百姓捆得緊緊，動彈不得。記者們所經之處，老百姓呆若木鷄，不敢交談片言隻語。我們的活動範圍受有限制。偶然到商店買些東西，便會受到匪幹警告，說生命不受保障。有一位外籍的牧師記者訪問教友，僅僅問起姓名住址，立即受到匪幹禁止，說他無權過問。記者對外發稿，要受匪幹的檢查，外來信件都已給折過。

「邊區」有平等嗎？沒有。舉一個例，王實味寫了一篇「野百合花」，批評他們不平等待遇，「衣分三色，食分五等」，這確是事實，却掀起了整風運動，把王實味整的死去活來。毛匪個人的享受，是突出的，但看他所吸香煙，一枝接着一枝，煙癮十足，都是外來的名牌。他吸煙有一特技，他能猛然一吸，把煙氣整個吞下，不容有一絲一縷洩出口鼻。他是習慣於全部吞食的。

然而，他們口口聲聲「民主」「自由」，也還嚷着「統一」，所謂「民主的統一」。毛匪說：「周恩來那年三月十二日發表的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」的演講，可以代表中共的主張。我們會找到那篇演講，所談要點有五：（一）欲實行憲政，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：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，二是開放黨禁，三是實行地方自治。（二）憲法的本身，同意以革命的三民主義來建設中國。」

（三）國民大會的選舉法和組織法，主張徹底修正，並將國民代表重新選舉。（四）主張在抗戰期間，召開國民大會，實施憲政。認爲民主的動員，是最有力的準備反攻，取得抗戰勝利，而且從民主中，才能找到徹底解決國共關係的途徑。（五）中共對於自己的諾言，早已完全實現。「政治解決」的內容，應該是雙方的與公平合理的云云。其實中共對自己的諾言，果能完全實現，則中共問題早就不成問題。問題就在於中共不能履行諾言，並不斷地製造問題。中共一面談團結，一面製造問題，造成既成事實，進而迫使中央全盤認可，問題便愈談愈多。所謂「民主」，不能解釋爲部隊的自由擴張，政權的自由建立。在任何現代國家，都可有政黨的競爭，但斷不容以武力爲憑藉，割據稱雄。所以中共問題，乃是怎樣使中共恪守國家綱紀的問題。

當時中央所持態度，十分寬大慎重，依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決議，只希望中共能幡然自反，切實遵守其「共赴國難宣言」所提四項諾言，以擁護國家民族之利益，軍令政令之貫徹。「至於其他問題，本會議已決定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，召集國民大會，制頒憲法，儘可於國民大會中，提出討論解決。」

周恩來那篇演講，只是唱唱高調，爲中央出些難題。他與筆者長談時，猶以爲在這時召開國民大會，不特與民族有利，而且與國民黨也很有利。國民黨總是一個多數黨，無須顧慮到本身的地位。我說：「國民黨絕沒有顧慮到本身地位，問題在怎樣使國民大會真能反映全國民意，適當

地運用它的職權，奠立憲政基礎。譬如過去選出的國民代表，有的已亡故，有的已變節，有的待補選，其餘部分散各地，於此戰時，兵荒馬亂，這大會怎樣召開呢？根據你們「邊區」的經驗，也不得不把各級的選舉停辦。又如共產黨自民國十七年開過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，迄今十五年，還未開過大會，原因恐怕也由於戰時情況特殊，有種種困難之故。對於全國性劃時代的國民大會，如何能草率從事呢？」周這時插問一句話：「過去選出的代表還算數嗎？」我說：「怎樣不算數呢？一個負責的政府，不能把國民所選出的代表，任意宣布無效。」周便接着說過去的代表不能算數的理由，無非說候選人是由政府所派的鄉鎮長所推選，而且迄今已有多年之隔。我則認為過去的選舉方法并無任何缺點，而且早為國人所公認，不能在今日再予反對。至謂時間相隔已久，則可增選一部份代表參加，而不能將過去的根本推翻。而且果真要把國民代表全部改選，那困難更多，在戰爭正在進行的今天，一部分國土淪陷，事實上不可能進行選舉。如果貿然從事，勢必引起其他紛爭，如代表的合法與否的問題等等。這時恐怕國人的意志力量未見集中，而新的糾紛層見迭出，決不是戰時所可輕易嘗試的。周恩來這時好像頗有同感，以驚異的語調問道：「國民黨方面是不是真考慮到這些地方？」我說：「國民黨確因為考慮到這些地方，所以決定把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，展緩到抗戰結束一年以後。」我又追問：「照你看來，國民代表究竟將怎樣重選，才較公允，並可避免糾紛？」周深思了

一回答道：「可由國共兩黨及其他黨派，各提候選人來競選」。我問：「然則，國民黨提多少人？共產黨提多少人？其他各黨派又提多少人？這裏的比例怎樣分配呢？」周某並未明確答覆。我便加上幾句：「如果分配得不好，又會引起新糾紛的，終非戰時所宜。」

其實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，那裏有所謂民主統一，國民大會和實施憲政，只是借此裝腔作勢，騙騙國人，圖謀進一步的搗亂。記得我和周恩來那次談話，持續了五小時之久，問題牽涉很廣，幾乎無所不談。我當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，是主義的解釋問題。我認為毛澤東以新民主主義來解釋三民主義，有失三民主義的真義。周說：「那是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解釋的，三民主義本來有發展性的，可惜國民黨人士把這點忽略了，國民黨應該有這種自信，把三民主義發展起來。」我說：「國民黨確有這種自信，而且在國父遺教以及總裁言論裏，三民主義的發展性，已講得很清楚，國民黨始終照着去做，要把民族、政治、社會革命，畢其功於一役。從沒有把自己的任務，局限於所謂第一階段內，遺留一個社會革命在後面。因此，我們為求進一步的團結，這基本思想宜求其一致，其法最好由中共負責人，重新來一次說明，說明三民主義實現後，社會革命即同時完成，無須再來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，以免除不必要的誤解。」

一般情勢，宜作正面宣揚，以增強國家意識，使軍隊成為國家的軍隊，人民成為國家的公民。當時周恩來的態度很好，還能耐心聽我的話，至少他沒有像王震那個草包，來一場「鬪爭」。只是說也無用，中共自有其一套謀略，也就是現在所謂統戰。他們慣於統而戰之，戰而統之，非把國家搞垮，決不終止。然而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，上當也只能上一次二次。共產黨自己專搞專政獨裁，何來「民主的統一」。統戰的花樣儘管層出不窮，結果必然失敗無疑。

真理終必戰勝

這裏要補充說的，便是在山西克難坡所見情形。克難坡原名難村，在閻長官錫山慘淡經營下，已由最初的三戶人家，變成三千多密洞，結集一萬多人的場面。這裏是山西省黨政軍的總司令部，控制着二十三縣，還把力量深入到敵後。閻先生治事精勤，他每天四時以前起身，要求公務員也在四時前起身，辦公以前，有一小時的朝會。在朝會裏，閻先生親自出席致詞，並有一分鐘的靜默，由司儀喊給大家聽到：「各自檢查自己，是不是心死了的人？」「如有集團企圖，就不是心死了的人！」「能不容人，不是有集團企圖的表現。」所謂「不容人」，便是要自己好，同時不容人不好。公務員的工作，每天規定抗戰勞動八小時，生活勞動四小時。公務員要嚴禁四害，便是「烟、賭、賭、賭、欺」，民衆方面的四害，是「烟、賭、盜、欺」，都在痛革之列。擁有十餘萬會員的民族革命同志會，便是民主檢舉

，整飭紀律的樞紐。

閻先生革新省政的大要，可以說是以民本為出發，村治為骨幹，勞動為中心，以實現「生產生活戰鬪的合一」，是國家總動員的一種新型的實驗。他運用合作社的機能，廢除了私商。運用包工制度，促進工業。運用兵農合一的辦法，把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。於解決各級糧食問題之下，順利的推行了不流血的土地革命。他指出與馬克斯主義的不同點，在於：「馬克斯的失敗，是在除了你的就是我的；我們的成功，則在除了我的，統是你的。」

那裏與中共的「邊區」，只是一河之隔，中共不時派人潛入騷擾。捉到了便嚴厲制裁，後來改變方針，捉到了予以短期講習，再放回去，讓他們自己去作個比較，究竟那邊做得對，做得好。結果匪幹不敢再來，來了也不願再回去。閻先生稱之為「革命競賽，真理戰勝。」

是的，中國不需要共產主義，或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。毛自己說過：「中國缺少大工業，現在還談不到社會主義。」「現在中國是封建的地租制度下分散的農業經濟，談不到社會主義。」我們便無須穿了毛衣再等西北風來。而預防社會革命的發生，早有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，妥為安排。中共所玩弄的，只是一套套無原則的權謀術數，談不上革命，造反而已。

當我們自延安回來時，負責招待的匪幹問我：「參觀以後的觀感怎樣？」我說：「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恭維，說老實話：「人不就是機器；造謠不就是宣傳，政治不就是兒戲。」

歸來，承先總統 蔣公召見，報告此行經過。末了，貢獻兩句話：「由此益信中國的革命，只有循三民主義的道路才能成功；由此也深深感覺，我們的努力還不夠，有待切實加強。」

民國六十八年五月，於臺北。

書名： 立法院人民請願案 研究

作者：曾濟群

定價：二九元

凡民主治國家均允許人民有請願權，我國憲法亦明載之，然有關行憲後人民請願權行使情形，人民向立法院請願申請數量？應以何種方式提出？人民請願權之行使與立法院關係？本書均根據原始資料，切題加以分析統計，俾助讀者抓住問題核心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基本材料科學

曹正樸 編著

定價：一百八十元正

在現代科學的領域中，材料科學是發展較遲，但却最被重視的一門科學。材料科學之所以受到世人重視，數其原因，固非一端，但最重要的是由於時代的進步，人類的進步，人類對各種材料的需求不斷提高，並且與日常生活、社會建設、乃至國防工業相結合。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，材料科學的專業化就應運而生。

作者深感目前國內大專院校所採用之工業書籍多為外國原文本，對於有志于材料科學研究發展方面的讀者，難免有窒難之處。為收事半功倍之效，作者根據多年講授之心得，配合多方面所彙集之資料，自材料組成的基本原理，以至材料的應用，作一系統的介紹，並以圖片加以說明，以增進而藉著已有的材料知識，去研究發展及探求更新的材料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